

MINXINJU YU XINKE SHILIAO KAOLUE

民信局与 信客史料 考略

郑挥 郑了 —— 编著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成果
近代宁波商帮文献
史料整理研究丛书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民信局与信客史料考略 / 郑挥, 郑了编著. — 宁波:
宁波出版社, 2019.11
(近代宁波商帮文献史料整理研究丛书)
ISBN 978-7-5526-3599-7

I . ①民 … II . ①郑 … ②郑 … III . ①邮政 — 经济
史 — 史料 — 研究 — 宁波 IV . ① F632.75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9) 第 146723 号

民信局与信客史料考略

编 著 郑 挥 郑 了

责任编辑 张爱妮

责任校对 虞姬颖

装帧设计 金字斋

出版发行 宁波出版社

(宁波市甬江大道 1 号宁波书城 8 号楼 6 楼 邮编 315040)

网 址 <http://www.nbcbs.com>

印 刷 宁波白云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 × 1000mm 1/16

印 张 20.5

字 数 300 千

版 次 2019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9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526-3599-7

定 价 198.00 元

如发现缺页或倒装,影响阅读,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电话: 0574-87248279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资助
“近代宁波商帮文献史料整理研究丛书”编纂委员会

主 任 虞和平

副主任 孙善根 陶水木 王 辉

编 委 王瑞成 张天政 张如安

阮清华 沈建国 张 萍

应方舟

主 编 孙善根 李 斌



总 序

作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近代宁波商帮史料收集与整理研究(1840—1949)”(17ZDA201)主要成果的“近代宁波商帮文献史料整理研究丛书”陆续编纂出版了,其中缘由在此略为申述,以为告白。

本丛书所称的宁波商帮泛指旧宁波府属鄞县、镇海、慈溪、奉化、象山、定海六县在外地的商人与企业家群体。同时鉴于当今宁波行政区域实际范围,相关内容也将涉及近代余姚、宁海在外地的商人及企业家群体。众所周知,宁波人历来以商著称,特别是近代以来,大批宁波商人抓住近代中国对外开放与上海崛起的历史契机,开拓创新,奋发有为,创造了辉煌的经营业绩与灿烂的商业文化,宁波商帮被公认为近代中国最大的商帮,并成功实现了集团性的近代化转型,是近代中国极为活跃的一支商业力量,特别是对近代上海发展为全国乃至远东贸易、金融与经济中心厥功至伟,成为所谓江浙财团的核心与支柱,长期称雄中国商界,进而对近代中国经济社会乃至政治都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显然,全面深入地研究宁波商帮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但由于史料整理工作滞后等因素的制约,宁波商帮研究工作并没有很好地开展起来。鉴于此,2017年,我们以“近代宁波商帮史料收集与整理研究(1840—1949)”为题申报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并成功立项。

宁波商帮称雄近代中国工商界半个多世纪,活动地域广阔,经营门类众多,足迹几乎遍及大半个中国,并涉足中国港台及海外,留下了无数的记载、遗存与印痕。就史料的载体与形式来说,从传统走向近代并在近代获得了更大发展与成功的近代宁波商帮,其史料散见于近代报刊、档案、方志与谱牒、口述资料、文集及手稿等

文献,其中既有碑刻等传统文献,又有报刊、口述资料等近代乃至现代的史料形式,迄今没有进行系统的收集与整理。本课题旨在广泛收集和系统整理近代宁波商帮文献史料,特别是要注意收集其中散落在民间个人手中的各类史料,包括手稿等未刊文献。按照申报书的目标与要求,并根据近代宁波商帮史料的重要性与珍稀程度,我们拟陆续整理出版若干史料集。其中既有宁波商帮行业与人物及日记、书信、碑刻等史料性质的专题性史料,又有相关企业、同乡团体等个案史料。最后我们将整理出版多卷本的《近代宁波商帮史料索引》。同时,考虑到人物在宁波商帮研究中的重要性,我们将在史料收集的基础上整理编纂若干宁波商帮人物年谱长编,这实际上是相关人物的资料长编,具有很强的资料性,以便为进一步的研究奠定基础。

需要说明的是,“近代宁波商帮文献史料整理研究丛书”是一个开放的平台。我们将努力扩大本课题研究的队伍与力量,故丛书的编纂者以课题组成员为基础,但不限于课题组。同时我们将充分吸收各界人士的建议与意见,以申报书为基础,根据相关文献的收集情况,对丛书的编纂出版进行动态的调整与补充,以便把更好的近代宁波商帮史料文献及时整理出来,公之于众,为学术服务。

限于学识与能力,我们的整理与编纂工作特别是其中的选编与校注难免存在不当和差错,在此诚恳地期待专家学者与广大读者的批评指正。

孙善根

2019年2月



欣闻宁波大学“近代宁波商帮史料收集与整理研究”课题组在宁波出版社支持下有意将郑挥先生的“民信局和信客”相关论著结集出版，这是史学界乃至文化界的一大盛事。宁波出版社的真知灼见不但能够使郑挥先生的珍贵收藏以系统性研究的方式问世，更能以此弘扬与表彰宁波在文化事业上的贡献，可谓一举两得。如今能够有这个难得的机会来写一篇简短的序，除了倍感荣幸之外，希望还能够以历史学者的角度来说明为何出版郑挥先生的收藏与研究对学术界和文化遗产保护来说是一件非常重要的工作。

在中国史学研究中，从中古史到近代史，邮政研究是一块被遗漏的领域。无论是中国学术界还是外国学术界，对中国近代的邮政研究都在起步阶段。而在这起步阶段当中，对于民信局和信客的研究更是缺乏。个中主要原因有二：第一，大部分学术研究的目光都放在政治和上层经济层面，例如重要政治人物、权力的结构和与其明显相关的主流金融体系。第二，史料的缺乏，使得针对民信局和信客的系统性研究变得异常困难。然而，民信局与信客却与民间社会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因为那些通邮系统不仅为商人所用，更是为广大的百姓服务。该复杂的私人通邮系统与民间社会牵涉的范围之广和深正凸显出了郑挥先生收藏的珍贵性。

郑挥先生的收藏特色有四：第一，时间跨度长。从道光年间到民国时期，可以充分展现出那些民营邮政服务随着时代进程的发展而转变。第二，邮政系统的丰富。从个人信客到加盟形态的跨区域民信局的经营形式，可以展现出民间邮政系统的复杂程度和灵活性。第三，资料的多元。从信封、信纸，到支票、账簿和收据等等，充分地体现出该项通邮系统所牵涉的人、事、物的复杂和绵密。第四，地方色彩

的浓厚。郑挥先生的收藏集中(但不局限)在长江流域,尤其是长江中下游地区,透溢出区域人文和经济活动的诸多信息,其中钱塘江流域的活动又占着相当大的比重,从中反映出宁波和宁波人在近代经济史上跨省、跨界和跨社会阶层的举足轻重的活动中有着独特位置。

当今,中国大陆不少地方政府的文物保护意识已经相当觉醒,宁波市政府更是不遗余力,在该领域上遥遥领先,令人敬佩。2016年9月借由拜访郑挥先生之际,有幸受邀参观宁波金融史馆,对于由费志军先生和孙善根教授策划的展览厅印象非常深刻,两位先生对文化遗产保护的用心表露无遗,令后生晚辈更想尽上绵薄之力,加入这个阵容。两位老师希望能够在展览厅的展示成果上再接再厉,来出版郑挥先生的收藏与研究,这对学术界和文化界来说都是一件再好不过的事情。相信它对民信局和信客等史料的发掘将起到推波助澜的促进作用。

蔡维屏

2018年9月

蔡维屏(Weipin Tsai),英国伦敦大学皇家霍洛威学院历史系高级讲师,于1993年在台北世新大学获得学士学位,1997年、2000年在赫尔大学(University of Hull)和伦敦经济学院(LSE)分别获得硕士学位,2000年在利兹大学(University of Leeds)获得博士学位。近年曾在华东师范大学、复旦大学、清华大学讲学及参与相关学术交流活动。



序 二

经过多年的积累，本人收集的史料及研究大致包括三部分内容：民信局与信客、宁波邮史、解放区邮票。现今，承蒙多方支持，特别是得到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近代宁波商帮史料收集与整理研究（1840—1949）”课题组的支撑，将《民信局与信客史料考略》列入“近代宁波商帮文献史料整理研究丛书”予以出版，得以了却一桩夙愿，深感欣慰。

民信局为民间邮递机构，类似现在的快递业，历史悠久，也是明清时期宁波商人从事的一个重要行当，进入近代仍相当活跃，以至于有该业为甬人独占之说。但限于文献缺乏等原因，至今学术界还少有研究。《民信局与信客史料考略》是笔者几十年来对民信局和信客历史资料的积累与探索，全书收录几十篇相关文章以及几百帧实物图照，原件多为本人多年来收集的藏品。近代史学研究探讨以实物为主，力求证据确凿。本书无套话、无纸上谈兵，而是汇集大量实寄封、信笺、折、单证和相关文书资料，将为研究我国近代交通邮递史、民信局史、金融史与近代宁波商帮提供重要文献支持。

本书主要内容包含对民营信局创始年代的考证和研究；对民营全泰盛信局的考证；对旧时走信人（信客）史的探索；对甬申线轮船信客和钱塘江流域川船信客封笺的解读与介绍等。其中以故事形式按年代顺序排列图文的有《镇海竺师爷信笺》《宁波月湖陈有彩先生遗信辑存》《董纪棠信客传递慈城冯氏信笺集》。部分文章曾在《上海集邮》和《邮史研究》杂志发表。

河南郑州王大海（汪流）先生是我在华中建设大学和山东大学新闻专训班的同学，也是我生命中最亲密的兄长和朋友。大海兄是中原地区著名杂文家，河南省

作协和杂文协会顾问,本想这篇序言请他来写,可惜其早年已病逝于郑州,临终前他在给我的信中称“你是我生命中最诚挚的朋友”,他对我的关怀,无以言表。20世纪80年代初我刚从逆境中走出来,他就专程从中原独赴江南农村来看望我们全家,近六十年来我一直将他当作长辈。大海在其杂文集里引用了王小波一段极有深意的话:“我以为知识分子的形象可以这样分界,一种人一世的修为,是要做如来佛,让别人永世跳不出他的手掌心;另一种是想在一生一世之中,只要能跳出别人的手掌心就满意了。希望大家都做后一种知识分子,因为不管是谁的手掌心,都太小了。”在史学界也一样,不能迷信于名人、专家,应该多多向先人学习,要做到博核、疑古、善悟,在疑古上既要我能疑人,又要允许他人疑我。一个纯正的研究学者要“发人之所未发,言人之所未言”,最低限度亦要发出几点他人未料、独到的言论。

古今交通邮递信笺史料浩如烟海,特别是明清时期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民间邮递活动十分活跃,它同各时期的经济发展与金融演变密切相关。但相关内容历史少有人搜罗梳理,诚如英国伦敦大学皇家霍洛威学院历史系蔡维屏博士所说:在中国史学研究中,从中古史到近代史,邮政研究是一块被遗忘的领域。本人不揣浅陋,愿做探索之旅,当然限于才疏学浅,书中不足之处太多,聊作抛砖。最后要感谢宁波出版社为本书几百帧藏品图精心排版,将大量重要的珍贵信息记载下来,使得沉淀久远的史料重见天日,呈现其宝贵的价值。

郑 挥

2018年7月

郑挥,1930年生于上海。1945年于苏北淮安新四军总部参谋处入伍,后至华中建设大学、山东大学文艺系新闻专训班学习。曾在华东大众日报社、鲁中南报社、前卫报社工作。南下后在华东“革大”二部九支部集训,经华东局组织部、上海市委组织部调至中共上海市静安区委工作,1981年调宁波工作,1990年离休。



一、作为民间邮递机构的民信局在商业领域中历史悠久，晚清达于鼎盛，宁波商人在其中居于举足轻重的地位，但从事该业者并不以宁波商人为限，活动地域曾经遍布全国。本书分类辑录笔者长期来所收藏的与民信局、信客相关的实寄封、信笺、折、单证及其他文书资料，并加以考证、解读，以弥补文献史料的不足。

二、本书内容安排先后，大致以藏品存世或相关专题出现的时间为序。

三、对书中需要解释的人、事、物及相关概念，于括弧中进行说明。

四、藏品图片大多数为扫描件，个别为藏友所拍。因年代久远，藏品纸张发黄，字迹褪色，扫描件尽量保留藏品原来底色。

五、对藏品文本中的繁体字、异体字，一般以现行简化字处理，有些古体字、数额的大小写，则保留原字。藏品中因字迹模糊而辨别不清的字或文字残缺者用“□”表示，“X”等符号则为藏品原文所有。

六、藏品中涉及商码表示的，在解读时直接改为大写汉字，如“𠫪千”改为“伍仟”。

目 录

CONTENTS

001	总 序
003	序 一
005	序 二
007	凡 例
001	第一章 信局的经始年代与特征
010	第二章 真龙现身 —— 清道光通裕信寓碑释读
017	第三章 宁波早期民信局实寄封
025	第四章 民间水路船递银信管窥
052	第五章 镇海竺师爷信笺
120	第六章 全盛(全泰盛)信局资料辑存
135	第七章 湄云号大兵轮军士信笺释读
142	第八章 宁波福润信局邮温州信笺辑存
146	第九章 江夏钱庄信局封辑存
152	第十章 钱庄与信局关联信笺辑存
176	第十一章 宁波月湖陈有彩先生遗信辑存
225	第十二章 李薇庄与大清裕苏官银钱局
236	第十三章 董纪棠信客传递慈城冯氏信笺集
276	第十四章 抗战时期宁波邮政与信客活动
284	第十五章 信客徐云芳口述札记
290	第十六章 杂件一组

第一章 信局的经始年代与特征

长期以来,对于中国民营信局创始时间的意见,基本上倾向于明代永乐年间,最初产生在商业发达、沿江河海交通便利的宁波,距今已有六百余年历史。从近八十年来的史书译著以及邮刊上所发表的文章来看,关于经始时间的论述基本上都是传抄的,没有一处能够对明永乐说提供翔实的资料与证据,混淆不清,非常遗憾。查阅宁波南宋宝庆《四明志》,元至正《四明续志》,明成化《宁波府简要志》《宁波郡志》,清乾隆《鄞县志》,以及古代诗词、小说、杂记等,都未见有信局(私营邮局)之记载。无论正史或野史都找不到明代永乐说的有力证据。由此看来,明代永乐说有点捕风捉影的味道,存疑甚多,需要史学界和邮学界同人不断发掘,深入研究。

一、明代永乐年间甫有民信局之说

1963年《集邮》杂志10月号发表的史式《从明代开始的民邮》一文,内称“到了明成祖永乐年间(1403—1424)专门办理民邮的信局就诞生了,在这以前中国是没有民邮的”,“距现在五百多年之前,中国第一家民信局就出现在当时商业最繁荣,交通最便利的浙江宁波”。(笔者按:宁波在明代何年何月由何人建立了首家何称谓之民信局?可惜没有任何依据和实证)1963年10月号《集邮》另有季文《信与信局》一文,内称“据考公元1403—1424年明永乐我国才出现第一批有组织的信局,由私人经营,除了代人送信之外,还兼营汇款货运业务,这种民营信局又称民局,当时遍及全国各地”。上述论点如能成立的话,明代戏剧《苏三起解》中的苏三就不需要到洪洞县江边去找商船请求捎信给南京的亲人,她完全可以在县城由信局寄发。

《集邮研究》1988年第三期陈京《明驿初探》，内称明永乐年间产生了中国古代通信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事件，即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诞生了真正的专业性民间私人信件递送机构——民信局。截至鸦片战争以前，全国民信局多达1000多家，仅宁波一地就达125家。1994年7月27日《中国集邮报》有夏雷文《我国古代的私邮》，内称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15世纪明代永乐年间出现了民办民用的通信组织“民信局”，以后又出现了为海外华侨、国内侨眷传递信函、钱物的“侨批局”，这种专为商民服务的通信机构受到欢迎，因此发展很快，历时五百年……可惜这些传抄论文都未见有据可考、有案可稽、有物可鉴之翔实资料，更不要说铁证。

前已提及，笔者曾稽查历代多地县市通志，未见有信局之记载，最后在民国《鄞县通志》中找到了出典。《政教志》第1252页至1261页中“邮政”占8页，摘录几段供参考：“本县书报传递，在昔衙署则以驿站，民间则以信局。宁波信局势力之厚，几遍国内”，“吾甬素以商业著称，郡人足迹遍于全国，间且及于海外，故交通事业亦随商业而发展。当邮电未设施时，甬人首创立信局”，“民信局始于何时虽无从稽考，然自历史推究，约在明代永乐以后，而以宁波为其中枢，其营业则在清代道光、咸丰、同治以迄光绪初年为最盛”。以上“无从稽考”“其营业则在清代道光……”比较客观。后人著文修志时把“约在”“无从稽考”等语剔去，使用了肯定的语气，有的甚至添枝加叶！非常遗憾的是，宁波邮政在20世纪80年代修志时认定民信局始于明代永乐年，将先人所注“约在”“无从稽考”也都删掉了，却无任何实物证据。

澄清信局经始年代，对于纂修交通史志和邮驿志都有重要意义和参考价值，如果硬要套明永乐说，而实证和史料最早却是清道光、咸丰之后，真空了数百年，是不符合客观实际的。古代有驿递差便、食客专递、水路船递、信客私人或兵弁捎带、亲友手递（也称袖递）等，但同私营信局递送银信包裹的营业性质完全不同。

二、民信局经始年代浅析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建立邮传的国家，从烽火台到驿站，国家邮政贯穿了数千年的历史。自上古周承殷后，战国纷争，周秦汉唐文明灿烂，汉驿西通大秦（罗马），唐

邮东渡日本,南北宋之邮驿,元之站赤地跨亚欧,邮传历代多为军事和官方传递文件服务。而历史记载最早的私人信件是周元王四年(前472),越国消灭长江下游的吴国后,范蠡写给文种的千古流传之信。战国时诸侯中的智囊人物四君子曾建有私人通信网,所获信息先于君主,可谓早期之私邮。随着经济的发展,商业开始繁荣,由富商经营水路货物运输、银信传送或由商民雇用私人传递银信逐渐开展,在古代的诗词、小说、杂文中都已有记载,远可追溯到唐朝之前。如汉乐府民歌《饮马长城窟行》说:“客从远方来,遗我双鲤鱼。呼儿烹鲤鱼,中有尺素书。”这里的“双鲤鱼”,就是汉时的书信,诗人用了比喻的手法。刘禹锡《竹枝词》有“日出三竿春雾消,江头蜀客驻兰桡。凭寄狂夫书一纸,家住成都万里桥”,说明商行兼带民信由来已久,苦于没有健全的组织机构,“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铃声从西来,忽得濠州书”“写得家书空满纸,流清泪,书回已是明年事”,可见古代平民通信之艰难。到了明代永乐年间,随着资本主义经济在中国萌芽,商贸活跃起来,海运和大商行有了发展,货运同时兼带汇银、信物以至专递,但是并未形成专业的民信传递组织和通信网络,更没有健全的私邮规章制度。古典小说中,反映明代资本主义在中国的萌芽,反映商人和商业活动最为突出的是《金瓶梅》。西门庆是世袭大富商,家产几十万金,有几十个商行,缎子铺就值五万两银,自办加工作坊,有大批高档舶来品,如西洋布、奇楠香、犀牛角杯、象牙牌、西洋大珠、波斯猫、洋酒、水银镜等等。值得注意的是他还兼营长途水陆运输,有“镖行”“镖船”甚至保险业务,但是并未见有“民营信局”的出现。明代的对外开放经济随着经济政策的改变而走向了“闭关自守”。唐朝以来建立的集海关、外贸、港务于一身的“市舶司”,在宁波、泉州等地相继被裁撤,历史又走向下坡。

依据现有的资料对民信局经始年代试析于下:

1. 从宁波市邮志办找到一份民国二十三年(1934)3月1日宁波邮政局所登记领有执照的民局资料,计有总局43家,分局132家,合计175家,显示该时期信局趋于没落,但仍有参考价值。表分类计有:执照号、信局名称、开设年月、总局址、分局数、分局地址。其中信局最早开设是在咸丰元年(1851),有正大信局(图1)、全盛信局、天顺信局等,开设时间未详的有13家。最早的年限如上溯若干年则是



◎图 1

札发现于山东黄县(今山东省龙口市),该县是胶东半岛上物产丰富、商业繁荣之地。信札年代在清咸丰之后,为商民通信之实物,信封上虽未见盖“××信局”戳记,但书有“酒资不计”“脚力已付”“送信钱×百文”“信力三百文”“外有小包一个”“酒力在此付清”等字样,非民间袖递的手递封,已经带有非常明显的民信局特征。因此,说明胶东半岛上的民信局机构产生比甬沪一带要晚一些,但同时也说明了鸦片战争之后的咸丰年间山东沿海一带商贸繁荣,已经产生民局性质的通信机构,这批古封是一个重要佐证。

根据上述史料和实物佐证,民信局经始年代应在清道光前后。而挂牌的民营邮局(有“××信局”称谓)及其印鉴最早则见于东南沿海,如商业活跃、交通便利的浙江宁波和姑苏等地,其后以上海为中心,逐渐扩展到全国各地。显然将古代私人、差役、号商、轮船传递的银信一概称为“民信局”是有违客观事实的。民局的经始是在清嘉道年间,它承袭上千年来商民经营的通信组织和业务的同时,吸纳了近代资

清代道光年间,此表有重要的历史参考价值。表中另可见总局设在鄞县(宁波)的12家,上海11家,闽侯(福州)10家。设分局最多的是协兴昌信局,达24家,遍及全国各地。另据《宁波邮电志》记载,奉化县于道光元年(1821)在大桥设全盛民信局。

2. 目前国内存世最早的两件民信局实寄封实物,是慈城曹氏咸丰四年(1854)古封,以及已故集邮家姜治方先生所收集的清代咸丰九年(1859)由宜兴寄北京的信封。

3. 1992年4月《集邮》刊出王景文《新发现的古旧信札》一文。该信

本主义先进的邮政运营技能,在此基础上建立了信局的规章制度。尽管各地并不统一,制度混乱,但较之古代的私邮、信客、足夫传送银信已经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民信局经始于明永乐说,据称最初见于民国十年(1921)洋人邮务长 H.Kirkhope 所执笔的《邮政事务总论》开篇《置邮溯源》英文版,内书:“民局,为民间使用的邮政——以区别于为政府及官吏使用的,其产生似乎不早于明朝永乐大帝年间(1403—1424)。”也有译成“唯民间所用之邮递方法与官立之驿站迥然不相同,民间驿道之法有明永乐以前似未尝有也”。内还提到“因幕宾大都籍隶浙江绍兴之口岸,民局即滥觞于此。以后全国私立信局咸以此处为中枢”。此处“似乎”“似”并无肯定的语气。从此以后就传抄开来。时至今日各地史志和论文仍以此为依据,民间驿道(民信局)明永乐说由此成立,可叹并无实证,更无铁证。对历史问题的考证探讨不能因为说的人多了就成真理,真理的来源只能是实践和证据。

需要强调的是,对民营信局经始年代进行研讨时,必须将其与古代民信加以区别,两者性质不同。民营信局(邮局)建立于清嘉、道前后,不等于否定我国古代民信的存在。我国古代民间私人通信非常艰难,有钱人或当官的可以利用专差、兵弁、驿站传递书信。一般平民百姓只能依靠私人袖递或商行、商船顺便捎带家信。有了民营邮局,就迥然不同了,商、民、官员都可以随时随地去信局寄信、汇银和捎带包裹,民信局为方便广大民众还上门服务,广泛收受官、商、民信件、包裹和汇银。其组织机构逐步健全,并有严格的规章制度,信局挂牌有固定的邮路、寓所、字号、戳记,按距离收取费用,凡有遗失,照价赔偿,在民间享有盛誉。民信局在各地交通邮路,水陆皆备,总局之外设有各地分局代办,规模大的信局分局多达数十处,资金雄厚。此类挂牌的民信局迄今未见有早于嘉、道的。

有关民信局经始之历史评论,有广州《集邮家》报第 187 期周林先生文内提到的:“确实可靠的则是在广东省邮局里找到的旧档案,记录着汕头德利信局于 1856 年设立(而另一文件资料则是 1858 年设立)。”1856 年即清咸丰六年,比宁波邮电局所保存的信局登记档案的开设于咸丰元年(1851)的正大、全盛、天顺信局晚若干年。在《集邮博览》1994 年第 2 期及第 9 期,1995 年第 2 期上刊出的陈世祝、刘国良先生的文章,内考证了西南地区“麻乡约运输行”的历史,据考,“麻乡约”陈

姓,四川綦江人氏,生于清嘉庆年间,卒于1902年,面有麻子,抬轿为业,相传祖辈当过“乡约”(指奉官命在乡里中管事的人),故取绰号为“麻乡约”,久之忘其名。“麻乡约运输行”咸丰二年(1852)建于云南昆明,同治五年(1866)迁总行到重庆。何时开始兼营或建立“麻乡约信局”及其字号、印章、封单实物等,尚未见详情介绍。历史事实证明西南地区最早的民间通信机构始建于清末,而不是过往所说的始于明永乐年间。

近百年来对民信局创始年代有不少学者抱着实事求是的态度,并非人云亦云,他们经过深思熟虑,提出自己的看法,论述精辟。诸如邮王周今觉于民国十五年(1926)九月发表于《邮乘》第2卷第4期的专著《华邮图鉴征引书目提要》中涉及“帕氏此书开始即有误点数处……(二)谓民局信资一律每磅一角,殊不知民局信资以远近计值且不论磅重也。(三)谓民局有数百年之历史,而不知其在道咸以后始办立通行也”。另中国台湾史学家晏星(原名潘安生,著名邮史学家)先生在其所编著的《“中华邮政”发展史》一书第241页中论及“这位洋员对我国民信局起源,自始并无肯定的考证依据。只能说‘民间邮递之法,有明永乐以前似未尝有也’。一开头就用了很不确定的语气。不过他接下去的‘推论’却是若有介事牵扯到‘绍兴师爷’以及宁波的地缘关系等等,由于原始的‘假设’并无必然性,所以他的一切推论也就没有基础”。说得都非常明智。

对我国古代民信史和民信局史的研究必须同社会历史的发展与当时的政治经济相联系。邮政是社会经济的组成部分,不可能脱离现实而自立体系。民信局(包括“侨信局”)都是私营经济,自然同中国近代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演变相衔接,是在古老的中华民族从沉睡走向觉醒,从停滞不前走向新的转变过程中产生和发展的。它是上千年来在艰难的私人通信基础上,加上资本主义新兴的邮政业务输入影响下建立起的中国式的民营邮局,这就是中国古代私信同近代民信局之区别。大量的历史资料和存世实物证明了这一点,而明永乐说近乎玄虚,推论无基础,并不科学。民信局自清嘉、道之后创始至1934年被取缔,有它的辉煌时期,特别是清同治、光绪年间民信局为商号、洋行、钱庄、媒体、官员以及广大民众服务,推动了当时社会经济的发展,它们在历史上功不可没。